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中国共产党与百年反贫困的中国方案

王建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制度优势。从消灭私有制到以改革发展生产力,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从民族平等到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的脱贫道路是各民族共同富裕。从五年规划(计划)的工业化目标、全面小康社会到现代化强国,反贫困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是目标引领下的梯次推进战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还包含着消除世界贫困的终极人文关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反贫困; 共同富裕; 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17)

贫困既有国家、区域与个体之分,又有经济、能力与权利之别。从巩固执政地位出发,各国执政党一般都要发展经济,一定程度地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是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党的各级组织都在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着不懈努力,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方案。学者们或从理论维度考察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时代价值^①,或从实践维度总结中国反贫困斗争的阶段成就^②;却少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与行动进行整体性考察的研究成果。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行动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的政治使命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们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贫困是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则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③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消除贫困?

① 李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传承与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② 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机器成了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武器。机器生产使一部分人过度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失业。在马克思看来,“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①。由于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自身力量来消灭,换言之,贫困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因而唯有通过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具有制度优势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消除贫困,而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使命。

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消除阶级差别^②。这一政治纲领既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制度变革的行动纲领,也是工农群众获得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工农群众有了参与政权建设的政治权利,有了获得土地的经济权利,也有了受教育权,可以说,这是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的最初尝试。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多层次反贫困思想的形成时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领略这一思想的丰富内容:消除贫困不仅要赋予被剥削者各种权利,还表现为引领思想解放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影响观念解放的卫生防疫运动,并以党的领导人拿着铁锹与锄头走进荒山而达到高潮。1949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各项建设创造了前提,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人民的共同富裕开辟了新的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特色的反贫困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但这不代表贫困可以立即随之消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但“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③。这一贫困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体现为“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因而,党的八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④。解决了主要矛盾也就消除了“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

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消除贫困?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以《乘风破浪》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回顾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宣告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的开始,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制度的优越性使得人们认为,一个富强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及其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以为“大跃进”运动是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好途径。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急躁心理、决策失误与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使得当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挫折^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442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63-464页。

可见,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的探索,虽然没有根本解决贫困问题;但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消灭了剥削制度不代表就可以消除贫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就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重新审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制度运行的具体体制机制,审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到底是什么。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必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四年后,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反贫困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与西方国家反贫困的本质区别所在。

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使得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改变经济、文化、社会的落后状态,缓解和彻底消灭贫困,1994年4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③。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制定如此艰巨的刚性目标,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的巨大决心,更是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最大制度优势。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保证了反贫困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扶贫攻坚”到“脱贫攻坚”的战略转变,到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④。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使得中国的反贫困成就比世界银行规定的脱贫期限提前了十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为了不断深化改革,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召开的9次三中全会,都是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为了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摸着石头过河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⑤。这一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必将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治理效能,使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74、77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33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7-68页。

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脱贫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已经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总结中国百年反贫困实践,从实现民族平等到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从民族区域自治到西部大开发,从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的脱贫道路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前置性条件是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作为实现阶级解放的政治基础。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①。其后,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并给予优待是各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共同特点。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专门就少数民族问题展开论述,强调要“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同时,尊重“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②。可以看出,各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而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党的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的权益。

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离不开制度的支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原则的制度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提高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整个国家还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解决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放在重要位置。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国营工业还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明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扶持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工业从无到有,农牧业、林业、水利建设等得到较好发展,各层次民族干部和各类专门人才经过培养成长起来,所有这些,都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居住在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基于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影响,西部地区时常与贫穷落后、民族冲突、社会分裂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央决定把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特别是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而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必然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共

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7—768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0—251页。

同富裕。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西部大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何以人为核心,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在政策实施层面上,开发式扶贫为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内生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生存救助为主要形式的救济式扶贫,虽然保障了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但不能为贫困人口提供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不能从根本上让他们脱贫致富,部分贫困群众等着救济,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1984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要求纠正单纯救济观点,“明确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①。这标志着中国的扶贫模式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扶贫方式的转变提升了扶贫质量,使得贫困人口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成为可能。

如果说充分利用贫困地区资源为开发式扶贫找到了比较优势,那么提升劳动者素质则为开发式扶贫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1986年6月10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强调要加强智力开发,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智力开发无疑需要从儿童开始。为此,国家先后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编制《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目的就是教育提高新生劳动者素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为贫困人群增权赋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开发式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多措并举。在深入推进扶贫产业升级换代,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创新扶贫与经营模式等的基础上,健全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建立开发式扶贫的配套性措施,那就是完善保障性扶贫机制。为此,我国建立围绕因病、因残及深度贫困家庭受教育期子女进行的生活、健康、居住、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救助和机会保障制度^②,通过不断深化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的有机衔接,形成符合新时代中国国情、符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际需要的脱贫致富道路。

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难点是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意味着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也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制度性特点,这一特点意味着要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主攻方向,实施精准的扶贫政策。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致贫的原因不同,必须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收到实效。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他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③。为实现“精准扶贫”,党中央与国务院坚持民族和区域相统筹,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远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为主攻方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的“造血”能力,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④。

如何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期间明确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即“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9-540页。

② 孙久文、张静《论从开发式转向开发与保障并重的新扶贫模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③ 参见王海燕《大国脱贫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9页。

准、脱贫成效要精准”^①。可以看出,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精准施策,以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精准脱贫成为反贫困斗争的新目标。根据中央部署,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②。精准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贫困斗争中的创造性运用。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贫困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其中,制度性难题是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就是既要体现收入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性特点,又要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还要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缩小社会分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顶层制度设计。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分别就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进行全面谋划,为解决相对贫困,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持。

三、目标引领下的梯次推进战略

总结百年反贫困斗争史,大致分为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革命时期的反贫困是以建立新型政治制度,解决制度贫困为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懈努力,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完成了百年反贫困的第一阶段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解决经济、文化贫困问题为主要内容,以阶段性目标为努力方向的反贫困梯次推进战略,表现为从五年规划(计划)、全面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③

1. 五年规划(计划)中的工业化目标。五年计划的制度设计源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者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组织形式,在大工业及其他主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经济领导,以排除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性。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这也是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④。此后,五年计划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制度性工具。

借鉴苏联经验,我国于1953年编制和实施了以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恢复和发展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重工业,才能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在冷战背景下,也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维护国家安全。“一五”计划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使得五年计划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

从“二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五年计划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贡献,但没能解决贫困问题。如何让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还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基于此,“六五”计划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

① 罗晋汉主编《治国理政这五年: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巨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2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0-43页。

③ 从“一五”到“十五”时期称为“五年计划”,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改称为“五年规划”。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61页。

④ 《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5-586页。

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七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①。五年计划在目标设定上的理性回归,更好地发挥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五年规划(计划)也随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指令性经济计划,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指引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擘画国家发展蓝图、确定重大目标项目、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内容也从单纯的经济计划,发展为涵盖国家各方面的综合规划^②。

2.全面小康社会。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③以“小康”指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对中国社会状况的理性认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⑤。小康水平就是解决所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阶段性目标。

解决温饱问题为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小康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梯次推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⑥。从“建设”到“建成”,虽是一字之差,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表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以全面小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期目标,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国家建设的实践成果,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发展水平,也使得目标的设定切实可行,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就使得实现共同富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正是有了这个前置性的条件,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十五年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奋斗目标^⑦。可以看出,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史征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3.现代化强国。以工业现代化推动四个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推动国家建设的战略举措。如果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中国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就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⑧。“四个现代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执政承诺;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⑨,无疑是艰巨的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② 王文《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红旗文稿》2020年第23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8页。

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页。

⑥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⑧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584页。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

任务。如果说工业体系和小康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短期目标;现代化强国无疑是党和人民需要奋斗的长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同样需要分步骤来完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现代化目标分解为“三步走”战略^①。可以看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的推动下逐步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连接“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和第三步的关键阶段,要推动反贫困事业在解决温饱问题和达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小康目标迈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30年又规划了“两步走”战略^②。这意味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从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建设到全面小康社会,从四个现代化到现代化强国,从“三步走”到“两步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五年为一个发展的阶段目标,两个一百年为发展的长期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目标接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政策连续性的体现,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制度优越性。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而领导者要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的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能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在于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以止于至善的精神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群众路线也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④依靠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总结这段历史,党的领导与全社会共同参与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推动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组织保障,更是反贫困斗争的依靠力量。

为了加强对反贫困斗争的领导,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务院要设立一个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统筹规划和组织力量,从财政、物资和技术上给这些地区以重点扶持,帮助它们发展生产,摆脱贫困”^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建立了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利用各种渠道为贫困地区培养干部,同时从中央、省、地三级机关抽调优秀干部并组织志愿服务者到贫困地区工作^⑥。组织领导的专业化体现了党中央对反贫困的高度重视,也必然会增强反贫困斗争的针对性与工作效率。其后,从救济式扶贫到开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②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③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年,第341-342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190页。

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79页。

发式扶贫,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反贫困斗争也进入新阶段。

反贫困斗争需要各级党组织统筹施策、精准发力。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规划重大工程项目,统筹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国性共性问题,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辖区内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要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把精力集中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做好精准识别、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①。准确勘定各级党和政府在反贫困斗争中的职责任务,是为了避免在反贫困斗争中出现越位与缺位现象,形成从上到下、上下联动的贫困治理体系。只有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强化党对反贫困斗争的领导,形成合力,取得实效。需要强调的是,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贯彻落实党的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战斗堡垒。实践一再证明,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

受历史与自然生态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反贫困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举国体制则为解决这种不平衡提供了制度优势,如“结对支援”制度。为了加速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早在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中央就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②。198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对口支援成为中国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内容。与此同时,“七五”计划提出,“国家和发达地区要对这些地区继续给以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要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从各方面鼓励更多的人才到边远地区和后进地区工作”^③。这就使得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发展有了法律与制度保障,也使得区域平衡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反贫困设计了时间表、路线图与任务书。为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贫攻坚,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各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贫困县的定点扶贫工作。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帮助贫困地区培训人才、推广技术、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与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与沿海较发达省份,均对口帮助西部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通过科技承包、技术推广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科技发展水平。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帮助驻地群众解决温饱、脱贫致富^④。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领导力,已经把各种可能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消除贫困,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攻坚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诸多典型经验,表现为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大中城市和贫困县对口支援,科研、教育部门进山推广科学技术,民主党派到贫困地区进行智力开发,地方党政群机关抽调干部加强贫困地区工作,党员、能人“包户”脱贫等尝试^⑤。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既表明了任务的艰巨性,也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40页。

②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2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10页。

④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86-787页。

⑤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唯有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反贫困还要发挥贫困地区群众的主体作用。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①。在反贫困斗争的实践中,没有局外人,需要动员贫困地区群众共同参与,让贫困群体形成致富能力,才能取得脱贫致富的彻底胜利。

把反贫困称为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不仅是因为全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还由于实现目标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对于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伟大的一场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在此意义上,这就是一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战争。

五、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社会的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历程,它无疑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贫困和解放斗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见,以人为本是新世纪反贫困斗争的出发点。解决贫困问题的内涵就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扩展到了满足人的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需求,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脱贫的目标和衡量标准。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的反贫困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进入新世纪,开发式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坚持以贫困人口为本,围绕不同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分配扶贫资金、开展项目活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变人口压力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改变过去重物质扶贫、轻精神扶贫的模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扶贫重心的转移表明党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不仅是人类社会解放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反贫困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

① 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4页。

日程功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②。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③。中国人民的反贫困斗争同样离不开各国人民的交流合作,而中国反贫困成就也必将给各国人民创造更多机遇,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政府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就援建了坦赞铁路。这条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不朽丰碑,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反贫困做出的重大贡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多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并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以及各种发展项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还包含着消除世界贫困的终极人文关怀。

在2015年召开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指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同各方一道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④这是解决全球贫困难题的中国方案。建立反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改变资本逻辑主导的,以资本增值与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秩序,建立互利合作的国际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更是积极践行者。面对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中国政府把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各国提供,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有着逻辑的一致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为此,它要消除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制定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行动方案。较之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各党轮流执政带来的政策中断,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反贫政策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通过目标接力的形式,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反贫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人民战争,体现了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制度优势。

(责任编辑 徐楷森 王浩斌)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第20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8页。

③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47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2页。